

「明人出警入蹕圖」本事之研究*

朱 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提 要

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特重孝思，營建祖陵與皇陵，並親謁皇陵，開明代皇帝謁陵之始。成祖建陵於北京近郊昌平，國都北遷，後世繼統者除景帝外皆葬於此。仁宗以下君主，多有謁陵之舉。明代皇帝命畫工將謁陵活動繪成兩幅長卷，合稱「明人出警入蹕圖」，現存臺北故宮。故宮學者那志良、林莉娜論此畫為世宗謁陵故事，那氏雖蒐集了不少文獻資料，詳加考證，惟在判定皇帝為誰時，忽略了世宗之後的皇帝的可能性。再者，那、林兩位，對「入蹕圖」著墨太少。本研究由文獻考訂、圖像比對、實地勘查等方面進行，從解畫入手，特別是解決「入蹕圖」的關鍵問題，指出畫中皇帝不是世宗而是神宗。晚明畫人丁雲鵬應曾供奉內廷，為繪製「出警圖」與「入蹕圖」的重要人物。該圖所繪為萬曆十一年閏二月，神宗率后妃至天壽山與西山春祭謁陵故事。

關鍵詞：出警圖、入蹕圖、明神宗、明代陵寢、謁陵、丁雲鵬

*本文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一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謹申謝忱。

一、前　　言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明人所繪「出警圖」及「入蹕圖」絹本設色畫手卷兩幅，合稱「明人出警入蹕圖」，原與內務府庫所藏歷代帝后圖像同置一處，蓋沿襲明代以來之舊，肩鑄收藏，視同尋常圖繪，未經啟視。乾隆十二年（1747）底改藏於南薰殿，以示崇敬，故而著錄稱為宮中南薰殿舊藏。¹「出警圖」與「入蹕圖」縱均為92.1公分，「出警圖」橫2601.3公分，「入蹕圖」橫3003.6公分。「出警圖」繪明代皇帝出北京城由陸路謁陵，「入蹕圖」則為經由水路而還。由於兩圖「原簽不著何代」，²均無款識印記，後人詮釋解讀遂有出入。臺北故宮的學者那志良與林莉娜，都認定此畫作於明嘉靖年間，呈現的是世宗前往天壽山謁陵往返的情狀。然而那、林二人，甚至清代人士，對於畫作的內容，都不甚了解。本文之作，先審視前人的研究，再由解畫入手，特別是解決「入蹕圖」的某些關鍵問題，以此為基礎，再結合文獻與圖畫，推斷畫中皇帝應為神宗，所繪為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祭謁陵故事。

二、清人的鑑識與那志良、林莉娜的研究

「明人出警入蹕圖」為南薰殿藏畫。最早見於著錄是在清嘉慶十一年（1806）底纂成的《國朝宮史續編》，稱之「明世宗出警圖一冊絹本，縱二尺九寸，橫八丈二尺，坐像，身長五寸五分。」及「明世宗入蹕圖一卷絹本，縱二尺九寸，橫八丈八尺五寸，坐像，身長五寸。」並有纂輯者的按語：

臣等謹案：此卷題識，無世宗字，惟與世宗像軸同籃藏，像亦相類。考明史：嘉靖十八年春二月乙卯，帝幸承天，夏四月壬子至自承天。甲子幸大峪山，丙寅還宮。以卷中山川形勢、歲時風景證之，當為世宗也。³

十年後，清嘉慶廿一年（1816）閏六月，編定《石渠寶笈三編》，纂輯之臣懷疑宮史定為明世宗之說，考訂畫中皇帝著戎裝，疑此圖當屬武宗。⁴參與《石渠寶

1 《清實錄》第十二冊《高宗純皇帝實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301/12a-13b，乾隆十二年十月辛巳條。

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故宮書畫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頁93、94。

3 （清）慶桂等纂·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96/949。

4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錄於《續四庫全書·1081·子部·藝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嘉慶內務府抄本影印，2002），〈南薰殿藏二〉云：「謹案右二圖（按：指〈明人畫出警圖〉與〈明人畫入蹕圖〉），原簽不著何代，宮史定為明世宗，以嘉靖十八年三月帝至承天為證。考承天乃今湖北安陸府，世宗以分藩舊壤，因從巡幸，何緣忽用戎裝？又安陸在大江南，當日果由水程旋蹕，自應浮江北來，亦不得卻至西直門也。考明史武宗紀，正德十二年，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十三年二月己卯，太皇太后崩。六月庚辰，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竊意居憂上陵，猶用戎服。疑此圖當屬武宗。」（頁416）。另，英和曾對《石渠寶笈三編》

笈三編》工作的胡敬（1769-1829？）於同年十一月撰成的《南薰殿圖像攷》，則接受宮史的說法，認為所繪為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幸承天（湖北安陸）的故事。⁵

從清嘉慶以後，無人再論及此兩幅手卷。直至民國五十九年（1970），臺北故宮那志良撰成*The Emperor's Procession : Two Scrolls of The Ming Dynasty*，該書附有中文說明，題為《明人出警入蹕圖》。那氏從清人不同的鑑定入手，並查考《明史》有關皇帝謁陵的記載，歸納出可能性較大的三種說法加以探討。第一說是胡敬明世宗幸承天之說，認為世宗此行往返由二月中至四月中，歷時兩個月，而出警入蹕圖兩圖景緻一致，所繪絕非世宗幸承天這個故事。第二說是那氏依據《明史》的記載得出的宣宗奉皇太后謁陵之舉。然出警入蹕圖中的車輜都以龍為飾，換言之，此次謁陵無后妃偕行。不僅非宣宗時事，那氏更據此進而認為不可能是世宗嘉靖十五年及十八年的謁陵活動。第三說為《石渠寶笈》明武宗從葬太皇太后之說。因后生前坐車以鳳飾，何以死後用飾龍的車？加以在嘉靖六年重新疏濬通惠河之前，至天壽山謁陵是不可能循水路回京的。除了以文字史料進行考證外，那氏也將出警入蹕圖中的皇帝像與故宮所藏明宣宗、英宗、武宗、世宗的畫像做比對，認為與世宗的像比較接近，畫中皇帝以世宗的可能性最大。與胡敬不同者，那氏認為世宗此行不是前往承天，而是往天壽山謁陵。至於所繪是那次的謁陵，則不重要。因為「出警入蹕圖是謁陵的記錄，不一定繪的是那一次的謁陵。」⁶

認定為明武宗提出一些說明：「嘉慶甲戌，奉命續辦《石渠寶笈三編》，得觀歷代名蹟，中有明帝《出警》《入蹕》二圖，向標為明世宗像。《出警圖》則戎裝乘騎。《入蹕圖》則常服乘舟，舟將入城狀，而城闕橋梁宛然西直門高梁橋也。心竊疑之：明世宗自楚藩入繼大統，不應進西直門，且其時世宗未冠，亦不應面有微鬚。遂與同事遍查《明史》本紀，得武宗戎裝送葬一事，既與《出警圖》之末點綴山陵景象吻合，又與明季昌平河運糧可達西直門之路無差，因改標題並識於書。」（[清]英和，《恩福堂筆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1），卷下，頁63。此條資料係邱仲麟先生提供，謹致謝意。）

5. (清) 胡敬，《南薰殿圖像攷》，收入氏撰，《胡氏書畫攷三種》（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1）：「謹案：右二圖，原簽不著何代，宮史定為明世宗。攷明史帝紀，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葬於王妃墓，世宗本生母。十八年二月乙卯，幸承天。三月庚辰，至承天。辛巳，謁顯陵。四月壬子，至自承天。五月甲申，奉獻皇后梓宮於承天。七月，祔葬顯陵。帝時居憂，故謁陵御戎服以示變禮。然旋蹕時太后猶未葬，即改御吉服者。史稱禮部言：歲除，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滿。適逢正旦，朝會祭享，一切吉儀。所當酌議。帝定於歲除日，變服元色吉衣。元旦祭服，於元極寶殿行告祀禮。具翼善冠、黃袍，御殿。百官公服致詞。鳴鼓鐘，鳴鞭，奏堂上樂。元旦御殿，宜易吉，而樂不可作。世宗於禮制，多獨斷，故啟蹕用簫鼓銳吹，旋蹕則易服龍裳，一如平時也。」（卷下，頁22a-b）

6. Na chi-liang, *The Emperor's Procession : Two Scrolls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70), pp. 129-137.

繼那志良之後，目前任職於故宮書畫處的林莉娜也撰有〈明人「出警入蹕圖」之綜合研究〉及〈明人〔出警入蹕圖〕〉。與那志良相較，林莉娜增加了對今日明十三陵的介紹，惟觀點仍承襲那志良的研究，也認定是世宗。⁷兩人的研究也對畫中的儀仗鑾輿，以及全圖的結構與畫面的呈現，著墨不少。

然而，那志良與林莉娜的研究，在文獻的使用與研究方法尚有不周到之處。那志良雖蒐集了不少文獻資料，詳加考證，惟在判定皇帝為誰時，只考慮武宗或世宗，及此前曾有謁陵活動的皇帝，如宣宗、英宗，忽略了世宗之後的皇帝的可能性。再者，那、林兩位，對入蹕圖似不甚了解，以致認為「謁陵路線，既可以循水陸兩線，繪圖時避免重複，就把去程繪做陸路，回程繪做水路。」⁸或認為「入蹕圖繪世宗至天壽山謁陵之後，循水路由昌平縣乘船還宮。」並謂「入蹕圖卷尾繪世宗春祭皇陵事畢坐船而返，隨後護送隊伍緩緩沿山麓山口前行。畫面以山水為背景，一彎溪水蜿蜒而過，只見河上架有各式拱橋，柳樹長於水側，呈現出一幅優美的田園風光。旁有鱗次櫛比的園苑，亭池、屋院、城垣，為陵區域內其他的名勝古跡建築，應是帝后謁陵事畢臨幸遊憩之所。」⁹都是與實情相去甚遠的論斷。

三、「出警圖」的畫面與「入蹕圖」的解析

最早對「出警圖」與「入蹕圖」畫面做描述的是《石渠寶笈三編》，胡敬的《南薰殿圖像攷》大抵借用《石渠寶笈三編》，文字略有小異。《石渠寶笈三編》對「出警圖」的描述為：

設色畫。城闕崇坊，桃柳廣陌，其（卷）【按：括弧中為《南薰殿圖像攷》文字】盡處又見小城。城外列橋二，近山有碑亭，有宮門，山中松柏陰森，殿宇高峙（揭），當是陵寢所在。首列百官禮服，送駕都門外。次則羽林軍士，執兵擁護（扈）。又次，則鹵簿全備，簫鼓銚吹，前後導從。帝服（《南薰殿圖像攷》無服字）戎服，乘介馬，馬色黑白雜。後執蓋者二人，左右乘馬捧劍者二人，威儀之盛，闢衢塞（溢）路。凡為人，一千九十九。為馬，七百八十有五。輦，駕四象者一，駕八馬者一；十二人

7 林莉娜，〈明人「出警入蹕圖」之綜合研究〉（上、下），《故宮文物月刊》，十一卷七期、八期（1993年10月、11月），頁58-77（七期）；頁34-41（八期）。林莉娜，〈明人〔出警入蹕圖〕〉，公共電視臺〔走入故宮的名畫世界〕文字稿（未刊，1996）。

8 Na chi-liang, *The Emperor's Procession : Two Scrolls of The Ming Dynasty*, p. 137. 《明人出警入蹕圖》（中文說明），頁7。

9 林莉娜，〈明人「出警入蹕圖」之綜合研究〉（上），《故宮文物月刊》，十一卷七期，頁63、64。

昇而行者一，二十八人昇而行者一。輶，有四輪駕二十三馬者一。肩（《南薰殿圖像攷》無肩字）輿，用四馬駕者一，用十二人昇者二。車，飾窗戶以朱者七，加黃幄者三。旌旗列樹，營衛旁連，不能悉舉。¹⁰

清人的解畫，大體不差，尤其斷定「當是陵寢所在」，並謂「首列百官禮服，送駕都門外」，都極為正確。惜其將重點放在畫面中儀衛的部分，而未能明指所繪之陵寢為何？因而無助於對本事的認識，反而造成誤判。《清宮史》與胡敬認為「出警圖」為嘉靖十八年南巡承天之事，正是因不明瞭畫作中的陵寢所致。

「出警圖」可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百官送駕都門外。第二部分是皇帝出警之儀仗鹵簿。第三部份是陵寢區。本圖的關鍵是第三部份陵寢區，必須正確辨明所繪之陵區，才能論畫作本事。

此部分以牌坊為始，繪有各式建築物。其中關鍵畫面為繪四隅立有石雕華表的黃色重檐歇山頂建物，此建物為明代昌平天壽山陵區之長陵神功聖德碑亭（圖1）。蓋神功聖德碑亭四隅添建華表，明代帝王陵寢（甚至以前各朝代），僅見於天壽山陵區，實為創制，起了烘托作用，展現了神功聖德碑亭的體量與氣勢，更強烈突顯永樂之地位，為禮制性極強的崇高建築。¹¹ 知此，《清宮史》與胡敬推斷此圖為世宗幸承天之作確實有誤，顯陵睿功聖德碑亭無華表立於四隅。¹²

關鍵畫面的掌握，遂能判定「出警圖」繪明代皇帝前往天壽山陵區。知此，則知畫軸起始畫「百官禮服，送駕都門外」（圖2），都門為位於北京城西北之德勝門。明代皇帝至天壽山謁陵，毫無例外的一定是出德勝門北走。¹³ 精確而言，畫作呈現的是百官送行於德勝門箭樓外（圖3）。明代北京城各門都是有外羅城（箭樓）的建置以強化防禦功能，兩城間形同半月，外羅城又稱「月城」。

皇帝出警的儀仗鹵簿，佔據「出警圖」最多的畫面。皇帝全身戎服，騎乘黑色駿馬，旁有武將羽林衛士護駕，宮官隨侍在側。隨行人員中還有騎馬的文官，與樂儀隊伍。畫中繪有車輶輦駕肩輿，此行除皇帝外應尚有其他宮眷。在距陵寢區不遠處，畫作上方繪有城門城樓一座，為重檐歇山頂，屬皇家等級，應是位於沙河鎮的鞏華城（圖4）。¹⁴

10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錄於《續四庫全書·1081·子部·藝術類》，〈南薰殿藏二〉，頁415。(清)胡敬，《南薰殿圖像攷》，卷下，頁21a-b。

11 何寶善，〈「陵制與山水相稱」的藝術傑作—吳中規劃設計明長、獻、景三陵〉，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0），頁306。

12 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主編，〈明代陵墓建築藝術概論〉，《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第7卷·明代陵墓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2），頁24。

13 (明)呂岱，《明宮史》（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1999。以下同版書不詳列出版資料），24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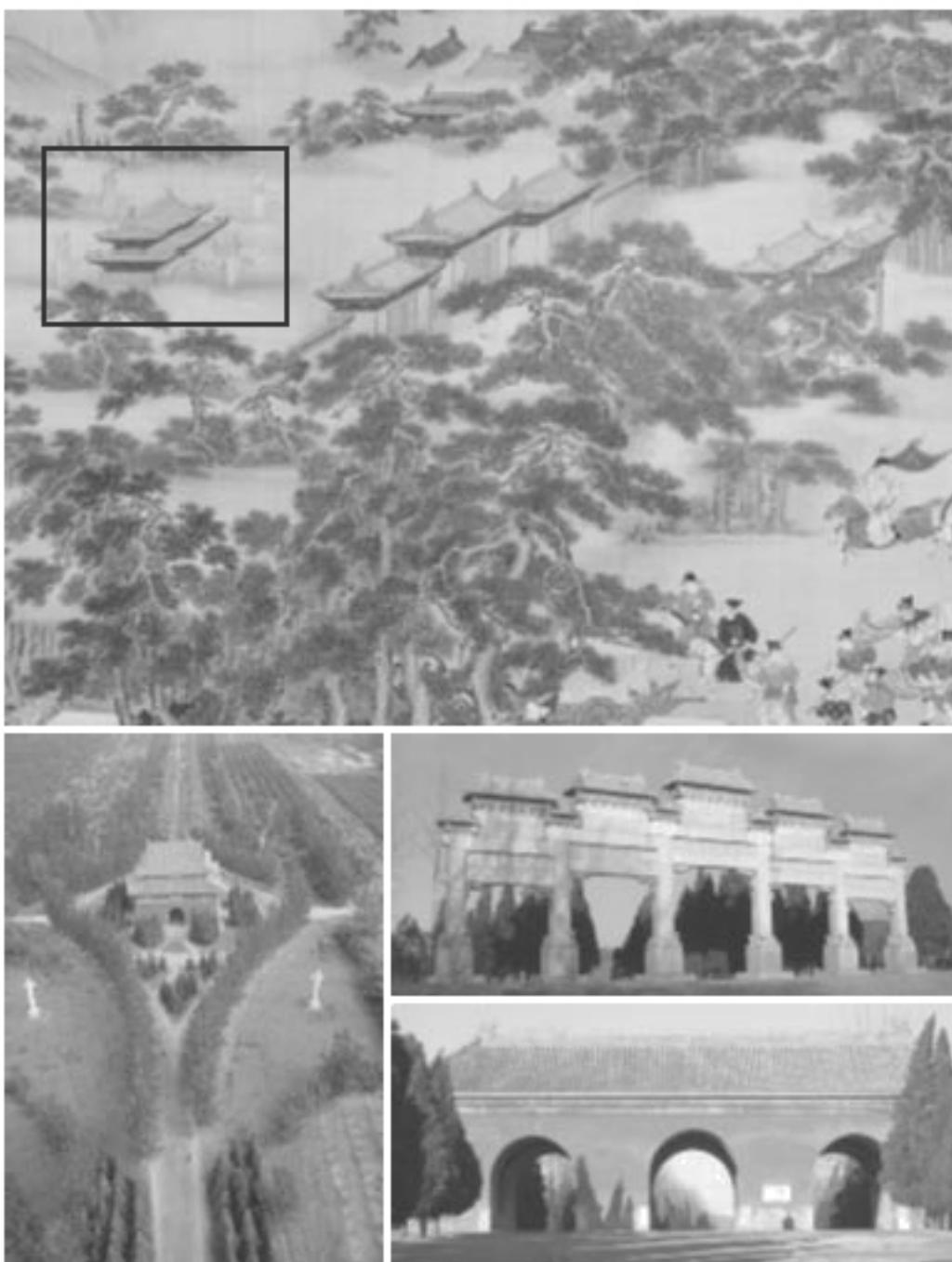


圖1 出營圃馬年。左起為石牌坊，中為大紅門，裡內為長陵神功聖德碑亭，下右上圖為石牌坊側照，石牌坊彩繪已褪去，呈現淡白玉石質。下右下圖為大紅門正面照，齊出營圃街風，圖中大紅門形制有誤。作者實地拍攝。下左為長陵神功聖德碑亭的聯照。董天呈、施永南：《明清帝后陵》（北京：中國世界書出版社，1996），頁23。



圖2 出華圖局年 百官退馬於華門外



圖3 今後華門舊址（跡跡已不存） 作者實地攝影



圖4 出華圖局年 章華城北城樓



圖5 章華城北門遺址，右下為北門城廬 作者實地攝影

章華城在昌平東南二十里，其地本名沙河店，明永樂中建行宮於此。為了強化朕廟的保護，嘉靖十九年（西元1540年）築章華城，置守備駐防。章華城周四里，門四：南曰扶京，東曰鎮遠，西曰威遠，北曰長思。¹⁵ 章華城竣工後，明代皇帝御接多駐跸於此，停留一日，再前往天壽山陵區。畫中所繪，應是面向天壽山的北門長思門樓（圖5）。

14. 改稱代所存文書第十三卷圖：明十三處金闕、十三處閣、明十三處殿（三殿俱稱先太祖本廟者故），在成安縣首均有一處城池，為昌平州（縣）城，不特是奉城。然「出華圖」確實昌平之城池，可謂當為章華城，非昌平州城。蓋明代昌平州城十分繁劇，東、西、南三面有城門，北面無城門。（《明》聖學風華錄，〈昌平〉昌平州志），隆慶元年五二年則萬曆增修本，凡東西兩面皆有城門，北面無城門，此可斷言不是昌平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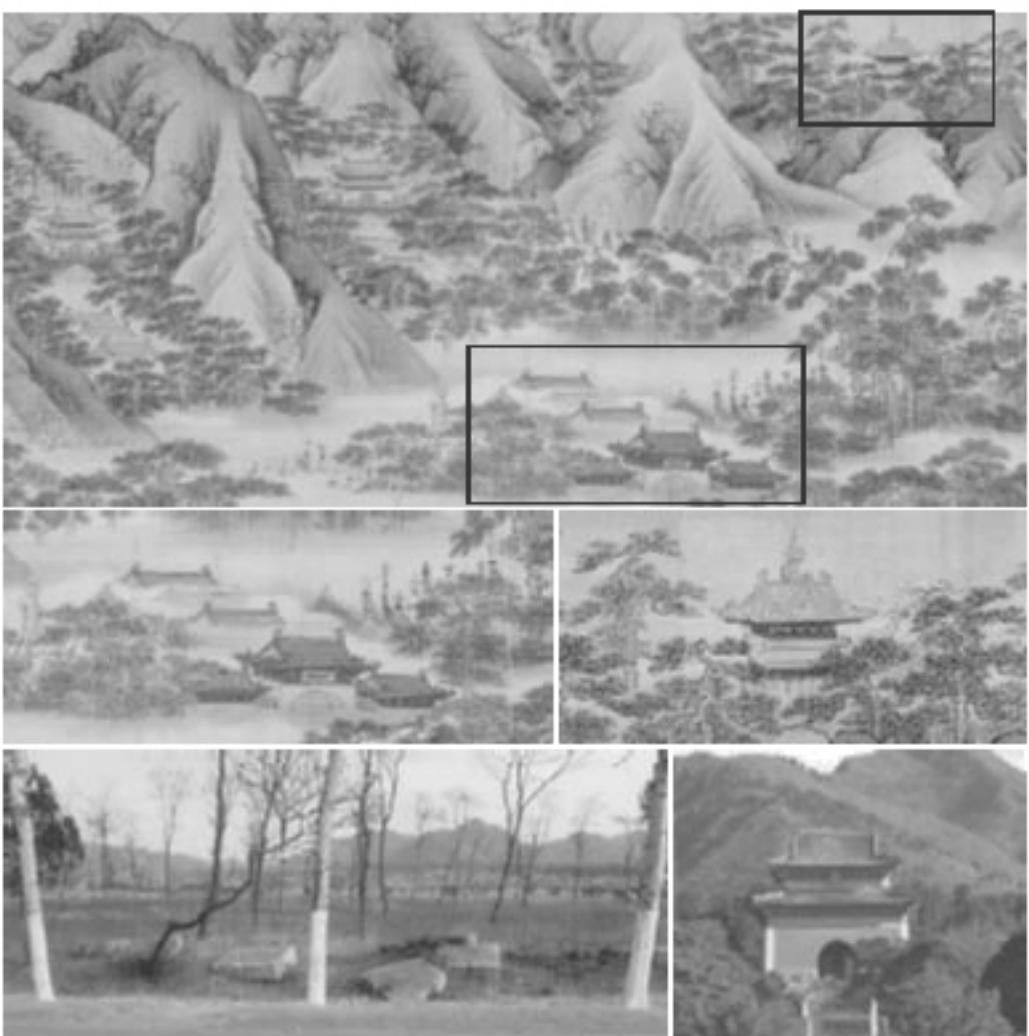
15. 《明史》（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193/10a-10b，《平時傳》，《大清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46。另據《明》各處，《明史》，127b-22b，《明史》，章華城內之宮殿建築，「內有林樂宮，西臨華門，西臨華殿，西廣武宮，東曰觀音之殿，西華宮，西集祥宮，西曰景惠之殿，中華威宮，中華極宮，東曰鳳春門，西布和門，西曰延秋門，中曰寧遠門，北曰寧遠門。」



圖6 出營圖局部。由右至左為漢里門、五空橋、七空橋。下方右圖為今漢里門。中為明五空橋遺址。左為七空橋橋墩遺址（攝於已故）。（今十三陵七空橋存明代舊物。作者實地拍攝）

「出營圖」第三部分呈現的是目的地天壽山陵區。繪有前述之石牌坊、大紅門、長陵神功聖德碑亭，及櫛屋門，以及五空（孔）橋、七空（孔）橋（圖6）。畫軸的最後有四處繪宮殿式建築（圖7），最前面有綠色屋頂建築群應是感恩殿，為皇帝朝謁在陵區內駐蹕的行宮。「在紅門內十五里，嘉靖十九年建，備聖湖幸陵駐蹕也。重門，正殿二楹，群面等房五百餘間。」¹⁶ 其他三組黃色屋頂的建築，應是帝陵。中間一座，毫無疑義是長陵（成祖），其餘兩座，或是獻陵（仁宗）（長陵左下）、景陵（宣宗）（長陵右上），或是永陵（世宗）（長陵右上）、昭

16. (明) 嘉靖皇帝：《長陵》昌平州志》，《堂本志·歲制》，246。



圖？出營圖馬跡。自右至左：永陵、長陵、昭陵，長陵下方綠色屋頂處應即為惠思殿。
圖下分則為永陵及惠思殿特寫。最下方右圖為今之永陵方城明樓，保留明代形制，可見出
營圖所繪永陵不十分正確。最下方左圖為惠思殿遺址，今僅存基子石塊。作者實地攝影。

陵（稚家）（長陵左下）。由於並未如實繪出各陵完整結構與特色，不易論斷，個人認為後者的可能性較大，蓋永陵、昭陵為神宗之祖與父之陵廟，神宗行春祭禮，長陵、永陵、昭陵三陵是親率后妃謁見，再者，畫面中位於長陵右下方（正確而言是左下方東南的位置）的陵廟，只繪出明樓的部分，形制為十字脊，實際上，天壽山無任何陵廟的明樓為如此形制，「出營圖」所繪有誤。據繪者之意，應是反映明人對永陵的描述：「在長陵東南，重門嚴邃，殿宇洪深，樓城壁

峩，松檜蒼翠，宛然仙宮，其規制一准於長陵，而偉麗精巧，時有以過之。」¹⁷特別是「樓城巍峩」，表現建物之崇華壯麗。

瞭解了「出警圖」中各建物所繪爲何，自然就能正確的解讀畫意，此畫表達的是皇帝前往天壽山陵區謁陵，惟重點不在呈現謁陵之禮儀與在陵區的活動，而是一路上出警儀容之壯盛。

至於「入蹕圖」，從清代迄今，對其所繪者爲何，都不甚瞭解。清人的解讀爲：

設色畫。宮闈城闈，橋樑衙陌，大段與前圖相應。惟以陸出，以水旋，布置稍異。自山陵至小城，從官皆乘馬。由此易陸而水。帝冠雙龍幞頭，服龍繡紫袍，當舟中正坐。舟尾戎服持兵者六人，前後朱服拱立者三人，內監以篙進舟者五人。旁一舟，陳設花果雜物，亦列兵衛。後舟，上加黃幄者二，垂朱簾者四。簫鼓鏡吹，前行導迎者四。羽林軍士，執兵擁護（扈）
【按：括弧中爲《南薰殿圖像攷》文字】者六。又，前載朱色箱，內監放爆竹前引者二。其黃幄肩輿、象輦、馬輦、人輦，及步行鹵簿，皆從岸上行。前驅至西直門（城坊署西直門三字）【按：應爲西直橋三字】，百官禮服郊迎大橋下，軍士各執械夾道鶴立，至城止。凡爲人，九百一十有五。爲馬，三百七十有七。舟二十。車，飾以朱者三。旌旗甲仗，具如前圖。¹⁸

「入蹕圖」應自左而右觀看，與「出警圖」自右而左相反，表示一往一復，¹⁹所以應倒著由卷尾往卷首看。清人將「入蹕圖」起始部分解讀爲「小城」，就可知其對該圖完全不瞭解，因此只能指陳畫面所繪人物景緻，並不能對畫作的本事提出說明。

對應於「出警圖」，「入蹕圖」也可分爲三部份。起始的部分，有房舍、小橋、流水、亭池及若干宮殿式的建築。繼之，爲舟行的部分，皇帝端坐船中。最後，則是水路結束，經橋樑上陸地，返回都城、紫禁城。爲了瞭解此圖所繪爲何，也應當掌握圖中關鍵的部分，「入蹕圖」的關鍵畫面是起始的部分。它所呈現的不是「優美的田園風光」，而是特定的一些建築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景帝陵。

17 (明)崔學履纂修，《[隆慶]昌平州志》，〈重本志·陵制〉，2/2b。

18 (清)英和等輯，《南薰殿藏二》，《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錄於《續四庫全書·1081·子部·藝術類》)，頁415。(清)胡敬，《南薰殿圖像攷》，卷下，頁21b-22a。

19 Na chi-liang, *The Emperor's Procession: Two Scrolls of The Ming Dynasty*, p. 1.

景帝於「土木之變」後即帝位，其兄英宗被貶為庶人，並未以王禮安葬，「葬以庶人，掩坎金山」。成化十一年（1475）始追復帝號，修享殿三楹，神廚、神庫、省牲亭，祠祭署，內官房，建立碑亭，大書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雖以環堵，植以松柏，守以守人，祀以歲時」。「然未御寶城，未建明樓，右偏側地勢，規制狹小，氣派不佳。不但不得好于禱，且不得下同睿庶者。」²⁰至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世宗首度以天子身分，詣金山，謁景帝陵，表達「追感之情」。²¹世宗「以碑亭列門外，非制，命移寢門內。又命以黃瓦易綠瓦。于是，復帝陵而非王矣。」²²清人翁方綱著《明憲皇帝陵》認為：「無寶城，無明樓，無碑，不封不樹。土冢隆起，可二三尺。周三十丈，徑十丈。方位向丙，氣而已也；而輒則陵，天下有陵焉如是者哉？冢外廣輪甚狹，周回皆堵，是爲內牆，夷廢堵離而爲二。內牆較小，爲初制非初告無可致也。東西橫亘七十丈。北倚山，南面空虛，中通無門，堵如直弦，東西堵三面遙長一百九十丈，其圓如輿，不能深廣，因山勢也。」²³清初顧炎武對景帝陵也有簡短的描述：「門三道，三重，殿五間，周垣。」²⁴



圖8 入華南局部－景帝寺故

20. (清) 翁方綱，《帝陵圖說》(十三陵特區文物研究所抄本，抄自江東李詩抄本)，頁10a-11b，《景皇帝陵》。

21. 《明世宗憲皇帝》(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2)，1254a，嘉靖十五年五月庚午條。

22. (清) 翁方綱，《帝陵圖說》，頁80b，《景皇帝陵》。十三陵抄本寫「恭成皇帝而王矣」，似有誤，應為「景皇帝而王矣」。

23. (清) 顧炎武，《帝陵圖說》，頁10a-b，《景皇帝陵》。

24. (明) 顧炎武，《香山山水志》，收入《四庫全書叢書叢考》文部235冊。(臺南：藝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山西省祁縣西谷鄉龍頭村吳江瑞氏題刻重刊本影印，1996)，卷上，頁1a。

「入廟圖」於舟行水路之前所繪土墻草鋪座墻坡起的部份，及此範圍內的植物（圖8），對照前面所引對明景帝號的描述，可知正是景帝號。

本人為了瞭解「入廟圖」所繪為何，曾親赴北京，在何寶善先生的安排下，由海澨文物管理所王曉軍所長商請高二剛先生陪同，前往明景帝陵（圖9）。雖然法由一側高點（處在玉泉山）俯瞰，但已足以瞭解景帝號的基本格局形勢，正如畫中所繪。再者，清人繪製的「五園三山及外三晉地圖」（色繪），圖中有明景帝陵（文字標示為「景皇帝」），角度與「入廟圖」幾乎完全一樣（圖10），²⁵更可證明「入廟圖」繪有明景帝號，且以特寫的方式做突出的呈現。



圖9 景春號碑亭 造並位於北京香山東
峰坡頂二號 作者實地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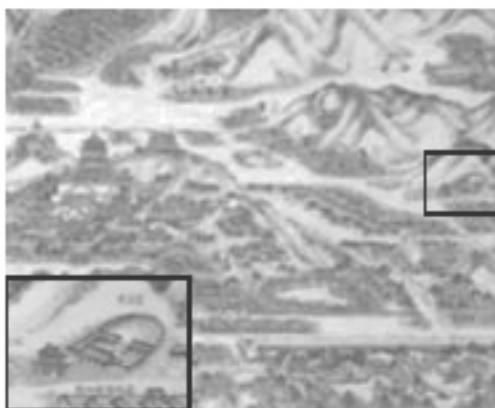


圖10 清人繪五園三山及外三晉地圖
圖中標繪御裕為明景帝陵 環城湖、純天
御裕，《頌和圖》(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95)，封面取圖。



圖11 入廟圖局部 玉泉寺



圖12 入翠龍馬寺 功德寺。圖左上玉泉池勝景畫，寺已全毀，原址後有乾隆御碑乙處，作者實地攝影

在景帝陵之西（前），螭有一亭，亭前有一池（圖11），此景應是始建於宣宗時的玉泉亭。明人描述玉泉山中景致，寫道：「……至泉所，泉上有亭，宣宗命構以銅鑄亭，亭下甃石為池，泉側出石罅，中置石為龍吐之，池前為石橋，水從橋下出，為長渠，曲折流三百步許，瀉歸西湖。」²⁶若將此段文字與「入翠圖」中所繪對照，令人有觀文作圖之感，文字與畫作所呈現之圖像相當吻合。

景帝陵東（後）繪有屋頂與瓦邊的建築，這部分應是「功德寺」（圖12）。該寺位於北京西郊西山東麓盡處，始建於元天曆二年（1329），規模宏闊，稱「大承天護國寺」。至正初，寺燬而復修。明宣德二年（1427）再度修建，擴據庭制度，改名「功德寺」。宣宗以後常宿，至西山皆臨幸駐蹕於此。²⁷李東陽李宗弘治癸亥（十六年，1503）冬十月遊此，記載道：「寺蓋宣德間所建，甚弘敞，後擴尤極精麗，廊柱及藻井皆皆金，鍍金者，布金於地，繡綵其上，以繪畫之，為人物花鳥狀，若繪畫然。又有刻絲織音一軸，織於繡綵。刻絲者，以絲刻爲畫，非繪非織，別具一法。」²⁸顯然仍保留宣德間風華，然而至嘉靖年間，世宗「革駕駐此，見廊廡金剛像摩訶，心懼，因坐僧宮殿悟過罪，撤去之。寺竟廢。」²⁹萬曆時

25 「五嶺三山九升三普地圖」有不同的版本，分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及第一歷史檔案館，本圖所用得自《順和圖》（張曉春、姚天新編；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95年6月）封面圖，故圖版僅列於第一歷史檔案館。本人曾於2008年9月1日前往北京國家圖書館閱覽，該館典藏者，最晚為光緒廿五年（1897）常行所繪，圖中噴泉寺壁旁標示之文字不書「景皇帝」三字并置之上方，而是右邊之本幅書「大明嘉慶皇帝」。

26 〔明〕李東陽，《順和圖》（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玉泉山〉，5523b。

27 〔清〕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海納萬十〉，100/169-1680。

28 〔明〕李東陽，《順和圖》（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山竹記〉，67/14a。

29 清高宗，《御制文鏡》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皇帝功德寺碑〉，178a。

神宗調膳，曾駐蹕於功德寺行宮。³⁰而且「功德寺駐蹕，行宮每用板席搭蓋。」³¹圖中所繪為寫實之作。

既然能確知「入蹕圖」起始部分所繪者為特定的建築，有功德寺行宮、景帝陵與玉泉亭，則可斷言這部分是北京以玉泉山為主的西山地區，「入蹕圖」始於西山地區，表達的正是皇帝在天壽山調膳結束後，至西山調膳。西山為明代另一座皇家陵墓區，稱「西山陵園」，葬明宣宗皇后恭懿章皇后、景帝、以及其他后妃、太子、公主等。³²經由文獻比對與實勘，可知「入蹕圖」所繪是表示皇帝天壽山調膳之後，來到西山祭拜景帝陵。根據《實錄》的記載，皇帝往西山拜謁的



圖13 入蹕圖起始部分

30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62)，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庚午：「上幸后妃營憲奉殿，幸恭懿章皇后、景皇帝陵、行禮畢，駐蹕功德寺行宮。」(1344b)

31 《明神宗實錄》，1345a，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壬申條。

32 不著錄入，《征明》《玉堂頌考》(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西山調膳事文》，415a-21a。



圖14 入葬圖局部 劍橋寺齊西山御陵。昔日碼頭已成陸地，箭處右圖中三角形標示處
作者實地拍攝

不只是景帝陵，還有宣宗廟后恭懿章皇后胡氏的陵寢。「入葬圖」起始的部分（圖13），有許多房舍、碑亭等建物，特別是首先入畫的建築群，與「門三道，二重，殿五間，兩廊，間短，碑無字」的描述大體上能符合，³³很有可能是恭懿章皇后的陵寢。其他類似形制的建物，表示的應是一座座的陵寢。所惜者西山為軍事禁區，不得其門而入，連海淀文物管理所的人也不知道胡后陵的確實地點，即使如此，並不影響對「入葬圖」的判定。我們可以很篤定地指出，「出轎圖」是繪皇帝至天壽山御陵謁陵，「入葬圖」是皇帝回程至西山謁拜宣宗廟后胡氏及景帝陵寢，因由西山還回，才得以走水路回京。明代第一位至西山謁陵的皇帝世宗，嘉靖十五年三月第一次前往西山拜謁後，就是「由西湖舟行還京。」³⁴ 曾日西山御陵，據海淀文物管理所高二剛先生告知，就在今日頤和園後面，玉泉山下北京新東方學校（功德寺遺址）前（圖14）。由此上船，走水路可回京。若是皇帝赴天壽山謁陵後，不至西山，則取原道由陸路返京。

「入葬圖」的舟行部分，雖佔最多的畫面，但我現的只是皇帝等顯貴人士從長河水路而返，對畫作本事的瞭解卻非十分重要。水路結束上岸，經由一座紅色的橋樑，此橋應是「高架橋」，位於西直門外，過此橋後，經西直橋牌樓，由西直門還京。「入葬圖」最後的畫面是紫禁城，表示皇帝謁陵結束後回宮。（圖15）正確解釋「入葬圖」是非常重要的，「入葬圖」既是繪皇帝至西山謁陵，取水道回京，則畫中的皇帝，非世宗即神宗。³⁵ 明朝只有這兩位皇帝於天壽山謁陵後，

33 (明)顧光武，《夏牛山水文》，卷上，頁11b。

34 《萬世家寶錄》，125頁，嘉靖十五年三月奏本錄。

35 曾有計嘉靖十五年三月至天壽山謁陵，恭請恭懷章皇后、景宜帝后。神宗于萬曆十一年閏二月謁陵天壽山畢，往西山謁拜恭懷章皇后、景宜帝后。（清）張文彬，《明會典》（臺北：世界書局，1960），《視聽錄》，172頁。



圖15 入廟圖第三部分：自姑東水導古高梁橋受舟，過西直橋入西直門，過西紫禁城。

至西山拜謁宣宗恭肅章皇后及景帝陵。其餘諸帝，宣宗、英宗根本就排除在外，完全不可能。武宗、穆宗因爲未至西山，故而也非靈中皇帝。

四、「出盡入廟圖」的皇帝歷指神宗

瞭解「入廟圖」的本意後，靈中皇帝的廟圖縮小到世宗與神宗，我們認爲畫中的皇帝應該是神宗，不是世宗。最重要的理由是世宗高陵由西山還京，「百官于阜城門外迎輶」，³⁶是由阜城門進入北京城。神宗於萬曆八年（1580）三月第一次南歸行春祭禮，雖未謁恭肅章皇后及景帝陵，但因駐蹕功德寺行宮，取水道「奉兩宮聖母御龍舟回京」，「文武百官及軍民耆老人等，俱于西直門外候迎。」³⁷萬曆十一年（1583）閏二月，神宗首度至西山謁恭肅章皇后及景帝陵，駐蹕功德寺行宮，亦由西直門入京。³⁸「入廟圖」水路轉東後登上陸地，繪有牌坊，上書「西直橋」（圖16），可知正是由西直門入京，完全符合《萬曆起居注》與《明神

36 《舊唐書實錄》，1837b，嘉靖十五年三月甲寅條。

37 《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第二冊，頁28，萬曆八年正月十五日甲寅條。《舊唐書實錄》，279b，萬曆八年正月甲寅條。

38 《明神宗實錄》，1337b，萬曆十一年二月庚子條：「癸丑年正月奉詔祀山陵，過玉宇燒燭門迎駕，西直門送駕。被駕往其舊來處。」《萬曆起居注》，第二冊，頁335，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十八日辛未條：「萬曆癸未歲，遣官、過玉宇于西直門城內，是守大臣率之武百官民者等，俱于門外候駕。」



圖16 入庫賈馬年 西直門牌坊及「西直門」三字特寫圖

《宗實錄》的記載，個人以為，畫工作畫時，雖是有意書寫「西直門」三字，藉以明白表示所繪為神宗調諫活動。

其次，「入庫圖」中的皇帝着戎裝乘馬，為該圖的重要聚焦點。世宗調諫出書入庫，《明世宗實錄》都未見準確的記載，但朱國相的《清獻小品》卻有世宗乘騎調諫的詳細描述：

嘉靖五年，世宗既奉孝皇帝太后謁廟，復成，十五年三月鑿拜春宮，三月丙子，又奉立太皇后奉立后謁廟，發京師，次玄禪宮。上素服麻冠，乘妙牠，芻被紫駕，乘龍馬。妙牠還行，晚，次沙河。次日駕發，入紅門，至行宮。始詣大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四地荒蕪，七號在此，如何守護？貴以量移審定，上不可；再封奏還一塊兵，南都京師，免勿後廢，允之。已謁長陵、獻陵、景陵，從致仕官賜用御之言，定葬城外十八道嶺，易名曰陽翠。庚辰，遣尚書陸。壬午，至沙河，就給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紗絲疋八斤。還幸西湖。既夕，至五泉亭。癸未，由青龍橋，奉皇太后暨舟遊西湖，至高樂橋，入阜城門。四月十九日，上崩于七陵。告禱工，桂選凡十日。³⁹

³⁹ (明)朱國相，《清獻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卷八》，612。

這段記載中提及世宗所戴鵝鵠冠，並指奉命與世宗同行御駕的禮部尚書夏言的詩句，可知筆記所記應是屬實。夏言撰詩「鳳輶恭紀十三首」，記嘉靖十五年三月鵠駕活動，其中〈玄福宮候駕〉韻：

玄福宮中卉翠衣，齊瞻天象壯儀威。
承恩敘最貴封列，尚禁前頭曉若暉。⁴⁰

夏言此詩作於玄福宮候駕之時，玄福宮位於御道上清河與沙河之間，建於弘治十七年（1504），俗稱御駕殿。⁴¹ 夏言的詩句，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鵠冠這項喜好制禮作樂的世宗所服裝，也證實了朱闕禪記述的真實。借鑑察明清兩代繪畫的禮制典籍或有關的圖集之書，及近人今人撰著的服飾書籍，都沒有龍威冠的圖像。惟世宗所戴者鵠冠，而非如圖中皇帝戴頭盔。且朱闕禪的記載，也同時指出世宗所著鵠絳紗袍（圖17）與「入狩圖」皇帝身服鎧甲不似（圖18）。「出營圖」所繪者，絕非世宗。



圖17 紗絳 王圻、王思義編纂，《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本版二卷，頁56。



圖18 出營圖局部 皇帝身服鎧甲不似

反觀《萬曆憲皇帝》與《明神宗實錄》，都明確記載神宗鵠駕騎乘。神宗第一次鵠駕是萬曆八年（1580）三月，「是行也，上自發京，以至還宮，往來皆乘

40. (明)夏言，《鳳輶恭紀十三首》，收入四庫全書忠貞日景書翰卷各員，〈四庫全書忠貞日景書〉，卷中76頁（臺南縣：莊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圖書出版社影印，1997），〈忠貞日景書〉，6/26。

41. (明)張志誠，《萬曆山水紀》，卷上，頁16。

馬，」⁴²《趙居注》與《實錄》記載神宗乘馬，顯然此事不同於其他皇帝，故而特別強調。此段記載與「入寧國」中畫皇帝端坐舟中，並無絕對的衝突，《趙居注》與《實錄》在前段引文之前同時有「奉兩宮聖母御龍舟回京」⁴³的記載，顯然神宗也乘舟。極有可能，神宗在水路這段也乘舟：水路至西直門外結束，轉換陸行，神宗又乘馬入京。萬曆十四年（1586）年底河南道御史許守恩奏疏中更提及「皇上戎次揚號親騎」⁴⁴，可見畫中所繪者極可能為神宗御駕情狀。再者，由神宗陵墓（定陵）出土的木馬偶、鐵盔、鐵鎧甲、弓箭、箭袋（圖19），與「出



圖19 明定陵出土木馬偶、鐵盔、鐵鎧甲、弓箭、箭袋
等。青祿出晉立者所戴者應為馬頭兜鍪 王沂、王居義攝集，《三才圖會》，本版一卷，頁266。

42 《萬曆紀事本末》，第二冊，頁22，萬曆八年正月十五日平寶泰。《明神宗實錄》，5705a，萬曆八年三月平寶泰。

43 《萬曆紀事本末》，第二冊，頁22，萬曆八年正月十五日平寶泰。《明神宗實錄》，5705a，萬曆八年三月平寶泰。

44 《明神宗實錄》，1813a，萬曆十四年十二月平子條。由許守恩的奏疏，可知神宗馬後戎車騎乘是參照「神武」的情形。



圖20 明世宗與明神宗畫像
（圖立誠宮博物院藏）

「春園」中皇帝騎乘之馬，與穿戴的服飾配件十分近似。⁴⁵ 基於事死如事生的原則，脫離出土文物應反應墓主生前情狀，諸物也應是神宗戎裝使用者。

如果將「出晉入湖圖」中之皇帝畫像，與世宗及神宗像分別比較對照，也可有助於鑑別畫中皇帝誰屬。雖然「出晉入湖圖」皇帝畫像為青壯樣貌，傳世的明代帝后像，多是神像，為崩逝前的容貌（圖20），⁴⁶ 世宗與神宗在位久，畫像面容稍呈老狀，但經比對仍可知寔世宗不疑，而與神宗相似。尤其是世宗與神宗神像頭戴者不同，世宗為烏紗折上巾，神宗為烏紗翼善冠。「入湖圖」端坐舟中皇帝所戴者為烏紗翼善冠，與臺北故宮藏神宗畫像相同，也與定陵出土者一樣，⁴⁷ 由此可知所繪者為年輕時期的神宗。（圖21）

經由以上多方論證，可知「出晉入湖圖」為呈現神宗戲獵活動的宮廷史畫，惟神宗此舉可能是師法世宗。嘉靖十五年三月世宗奉聖母壽誕，泛舟西湖，觀玉泉山，曾頒題「行舟次序圖」，禮部尚書夏言題賜此圖，記其事說：

舟行有圖，乃上親題焉。言載之。是行，御舟居中。左一舟，繪者少保文正二員，馬丘峰（按：內閣首輔辛峰）、丘言矣之。右，太傅武正一員，馬丘馬（按：武定侯郭勋）。舟共二十五艘。畫母以下，互客眷伴者，皆序列有是。⁴⁸

可見世宗暢遊至西山奉聖母泛舟西湖，曾作畫以紀其事。世宗之舉或為神宗所仿效，但世宗「行舟次序圖」呈現的應僅是在西湖泛舟的活動，表達的是世宗對母

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走進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走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上冊，頁214-219。下冊，頁310-313（J2017、J2026）、314-319（J2011、J2020、J203）。

46 明洪武，《洪武明太祖成服冠飾性質及服用考合》，《南京文博》，2001年第1期，頁73-76。

47 定陵出土翼善冠五頂：金翼善冠一頂、烏紗翼善冠兩頂、《走進》，上冊，頁203-205；下冊，頁111（W11）、112（W167）。

48 〈明〉夏言，《夏言集先生文集》，〈侍上祀成廟奉聖母泛舟西湖恭賦二首〉，45a。萬曆刻本。王五香集毛氏校刻本所延，並《潤朝山房考》（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226卷有注疏。



圖21 入屏圖局部 立皇帝冊中國。立皇帝冊為鳥紗翼善冠，與上圖神宗所戴且有下圖尤茲出土者（複製）相同，為紗翼善冠（複製復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蹟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史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下冊，圖一一二。世宗所戴為鳥紗折上巾（下左圖）。五折、五恩義綺集，《三才圖會》，卷兩二卷，頁1b。

頤的孝思。「入屏圖」畫面的處理及作畫的意念與此迥異，也可反證不是畫世宗御陵故事。

此外，某些產物的入畫，如翠華城、石牌坊、感恩殿、功德寺，也可證明所繪者不是世宗御陵活動。蓋翠華城、石牌坊、感恩殿皆建於嘉靖十九年（1540），在世宗最後一次天壽山御陵之後。⁴⁹ 功德寺則曾為世宗所號，⁵⁰若繪世宗御陵，不當有此產物。

49 翠華城與石牌坊修築年代，分見（明）朱學淵纂修，《直隸志》（嘉慶本），卷四本，刻本，124a，《直本志·卷四》；感恩殿修築年代，見不著撰人，《明帝廟圖說》（清抄本，上海圖書出版社），上册，《明帝廟說·卷之三》（此書無卷頁）。

50 清高氏，《御親文集》三集〈立廟寫四庫全書電子版〉，《皇帝功德寺碑記》，丁亥年。

五、丁雲鵬與「出警入蹕圖」

「出警入蹕圖」的皇帝究竟是世宗，還是神宗，也可從作畫的時間來判定。如果是出自嘉靖時期畫家，自然是繪世宗謁陵；若是為萬曆年間畫家所繪，或是所用的繪畫技巧是萬曆時期畫家者，自然就是神宗謁陵故事。

「出警入蹕圖」為宮廷畫作，要考察作者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蓋明代宮廷繪畫史的研究，詳於永樂至成化、弘治時期，入直內廷畫家的資料也多止於正德，嘉靖、萬曆時期頗有文獻不足之嘆。本人的研究助理吳美鳳女士，專攻藝術史，將「出警入蹕圖」與嘉、萬時期畫作進行比對，發現與萬曆畫家丁雲鵬的畫法有許多十分相似者。丁氏應參與「出警入蹕圖」的繪製工作，是一位重要的角色。

丁雲鵬，字南羽，號聖華居士，安徽休寧人。生於嘉靖廿六年（1547），卒年不詳，崇禎元年（1628）尚在。⁵¹為詹景鳳門人，工畫白描人物、山水、佛像。明季有關丁氏的文獻，似都未明言曾為宮廷畫師，清人王沆則有丁雲鵬曾入內廷作畫的說法，⁵²近人徐邦達也言丁氏供奉內廷十餘年，⁵³該說為大陸學界採用。考察丁氏的詩文畫作，清人王沆及徐先生的說法應可信。

明代宮廷畫師多授錦衣職，丁雲鵬曾因友人祝世祿任職休寧知縣期間（萬曆十七年至萬曆二十四年）⁵⁴，進京上計，作「送祝明府入計」詩二首，第二首詩最後以「何日刀環仍賜返，三農置酒樂堯年」⁵⁵結尾，流露出有歸鄉之意，應可證明丁氏曾授錦衣職，供奉內廷。再者，萬曆二十五年（1597）翰林院修撰焦竑編撰《養正圖解》作為教育皇長子的書籍，焦氏自萬曆二十二年皇長子出閣以來，就參與教育勸講的工作，遂「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戒者，稍加訓釋，並繪為圖」，裝潢成編進獻。焦氏「列於禁近」，輔導的皇長子居於九重深宮，所編之書

51 徐邦達，《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頁81。國立故宮博物院，《晚明變形主義畫家作品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623。

52 （清）顧文彬、（民國）顧麟士撰，顧榮木、汪葆祥點校《過雲樓書畫記·續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丁南羽山水冊〉條云：《無聲詩史》稱：「南羽畫大士羅漢，功力靚深，神彩煥發，山水溪豁深秀，追蹤古人，李龍眠、趙松雪不能遠過。」蓋力復北宗之學者。此冊十幅，皆用墨筆細皴作畫亭疊巒坡、網巾水、夾葉樹，界臺，人物細不及寸，而衣褶古雅，舉動若生。款署「辛亥長至前一日，寫於虎丘僧舍」，萬曆三十九年也。前後王沆十二跋，「丁南羽在前明供奉畫苑，一時名為繪師國手。或設色，或運墨，悉以淡濃之筆，乾潤之神，層疊而成。此為昔年成廟賜先文恪公，尤殷寶重」云云。（頁144）按：王文恪，名鼎，道光朝大臣。

53 本社編輯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丁雲鵬〉，頁6。

54 （清）廖騰夔修、汪晉徵等纂，《休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影印，1970），〈官師·職官表〉，4/15a-b。

55 （清）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丁南羽詩帖〉，27/62a。

用於宮禁，繪圖者自應是具有宮廷畫師身分，且為其中翹楚者。《養正圖解》的圖版繪製者，正是丁雲鵬。⁵⁶丁氏嘗供奉內廷，秀無姬妾，將《養正圖解》的圖繪與明代宮廷畫作相較，可看出兩者在佈局與繪畫技法上頗為相近（圖22）。又，丁雲鵬傳世畫作「崖山高」，著其作畫時間為「大明萬曆己亥九月之吉」（圖23），時為萬曆二十七年（1599），丁氏年五十三。年款書閱歷年號，或為供奉內廷之作。由上所論，至少萬曆十餘年至二十七年之間，丁雲鵬應在北京任官廷畫師。論者謂丁雲鵬畫風受唐寅、仇英的影響，⁵⁷其實應是有官廷院體畫的技法。丁氏繪畫手法與其曾供奉內廷，參與「出書入屏圖」的繪製有關。

以丁雲鵬的畫作與「出書入屏圖」對照，松樹樹幹、橋樑、雲氣等的畫法都十分相似（圖24-26）。茲以圖像並陳的方式，供讀者瞭解彼此的關係。



圖22 「寒林洞禽圖」（左） 縱57公分，橫32.8公分 北京故宮藏 中國歷史博物館，《華夏之尊》（北京：朝華出版社，1997），第四輯，元朝時期五清趙琳，頁100，圖94。《養正圖解》 丁雲鵬作「洞林對處」（中），「井底承甃」（右）。

56 〈明〉允托，《養正圖解》（臺北：臺灣寶島印書影印社影印，1981），〈序〉，頁3n。Seewell Jerome Oesting II引《萬曆野獲編》之記載謂丁雲鵬為《養正圖解》作者於南京，似應有誤。（Seewell Jerome Oesting II, "Ting Yun-Peng: A Chinese Artist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Diss.*, Michigan U., 1980, p. 395。）《萬曆野獲編》（名卷二）亦有：「其（叔）翁《養正圖解》並非山野名士丁布研之子。」並未言丁氏作畫於南京。見〈明〉沈錄等，《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25336-437。

57 胡亦知，〈明中葉入屏畫四家—杜雲、周臣、唐寅、仇英〉，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明中葉人物畫四家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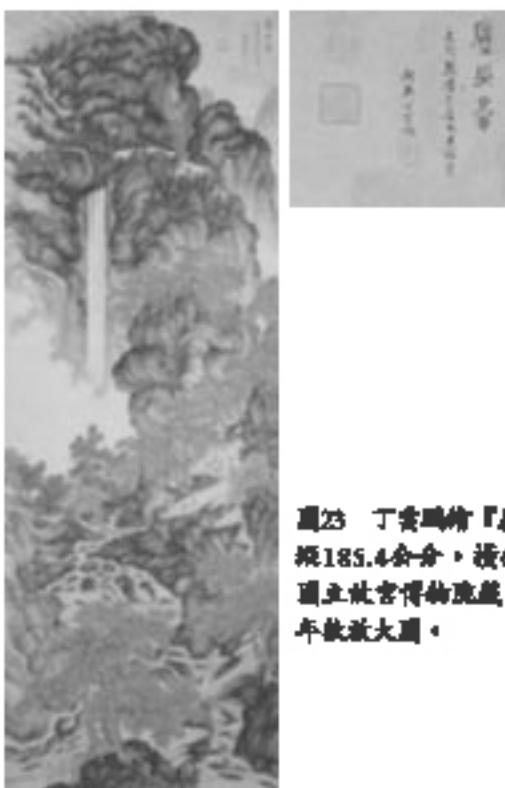


圖23 丁雲鵠繪「松山高圖」
縱185.4公分，橫45.1公分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右上為
年款及大印。



圖24 故宮博物院藏丁雲鵠畫法新風。左圖為由李國鼎題跋，右圖為丁雲鵠繪「松林鹿立圖」。縱139公分，橫21.9公分。北京故宮藏。中圖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第十五卷，明六（杭州、北京：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00），頁194，圖二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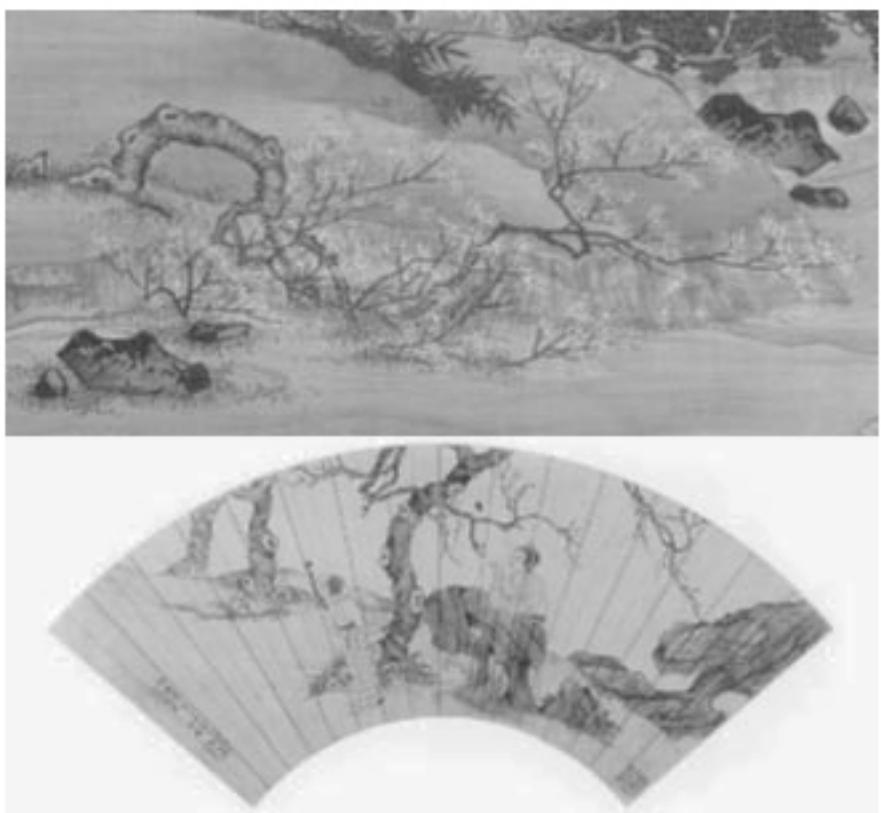


圖25 楊涓畫法奇風。上圖為入琴圖局部，下圖為丁雲鵠繪「洞琴圖」局部
縱169公分，橫41.3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叢稿，《中國繪畫全集》，第十五卷，明六，頁192，圖二〇五。



圖26 楊東中畫風法奇風。左圖為山晉圖局部，右圖為丁雲鵠繪「臥游圖」局部。「臥游圖」 縱37.3公分，橫70.2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叢稿，《中國繪畫全集》，第十五卷，明六，頁204，圖二一八。

六、「出營入陣圖」為萬曆十一年春祭調陵宮廷史畫

經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出營入陣圖」要呈現的是明神宗調陵的活動，調陵包括天壽山成祖以下皇帝陵寢西（金）山景帝及宣宗胡后陵。前往西山，駐蹕功德寺行宮，地近西湖，返程由水路，經長河，由西直門入京。

神宗曾於萬曆八年（1580）三月、十一年（1583）閏二月、十一年九月、十二年（1584）九月四次調陵，「出營入陣圖」所繪究竟是哪次的調陵呢？九月調陵是秋祭，途中所繪是春景，且兩次均未去西山，應可排除。而八年三月調陵的記載，許多都與「出營入陣圖」相合，惟此次調陵，雖至西山，但僅駐蹕功德寺，舟行返京，並未調拜宣宗胡后與景皇帝陵，似與「入陣圖」要表達者不盡相符。然而十一年閏二月的春祭禮，就文獻記載而言反而不如八年三月者詳實，或許是因為「一應禮儀事務，著各該衙門俱照萬曆八年例行」。⁵⁸換言之，十一年閏二月的調陵活動，應與八年三月者有許多相同處。

八年三月調陵，最特別的是神宗往回皆親駕，十一年閏二月之事，《明神宗實錄》則有這樣的記載：

以坐駕易湖山陵，令公孫文盛、督學吳隨仲護駕。令輜輶使張承光，內左孝子李文全、助衛軍承恩，統領帶刀府軍等衛官三十員，大旗將軍三百名，隨直駕駕往司。⁵⁹

又與八年同，諭令：「隨駕文武百官都許騎馬。」⁶⁰勦臣武郎隨直駕駕往回，萬曆十一年皇帝調陵再度騎駕是合理的推定。「出營圖」皇帝騎乘，四周有公侯帶刀武士護駕，隨扈文武官員即使在陵區內都騎馬，打破了「官員人等至此下馬」的規定，應是真實的畫面（圖27）。



圖27 出營圖是年
皇帝與從其帶刀武士

58. 《明神宗實錄》，133/6a，萬曆十一年二月丁酉條。

59. 《明神宗實錄》，133/12a，萬曆十一年二月壬子條。

60. 《萬曆紀事本末》第二冊，頁324，萬曆十一年閏二月五日戊午條。

要而言之，萬曆十一年閏二月與萬曆八年三月的謁陵活動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都是行春祭禮，去程陸路回程水路，至西山駐蹕功德寺行宮，隨駕文武百官都許騎馬。所不同者有二：萬曆十一年閏二月之行，前往西山有謁宣宗胡后及景皇帝陵的活動；萬曆八年三月雖曾赴西山，卻未謁陵。再者，萬曆十一年閏二月之行，除了是謁陵春祭外，更重要的是此行還兼擇壽宮，萬曆要親選陵地，其意義較八年三月者為重。「出警入蹕圖」所呈現的，應該是萬曆十一年閏二月的神宗皇帝詣天壽山並金山行春祭禮的水陸兩路儀容壯盛的景象。

依據《起居注》及《實錄》的記載，萬曆十一年閏二月的謁陵活動的行程及路線（圖28）如下：

日期	起居注	實錄
十二日 乙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卯刻，上率后妃發京，潞王送于德勝門月城內，居守大臣文武百官于德勝門外送駕。 是日，駕次鞏華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率后妃發京，潞王送于德勝門月城內，居守大臣文武百官送于德勝門外。 駕至清河。 駕次鞏華城。
十三日 丙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駕發鞏華城。 午，駐蹕感思殿。 是日，諭戶部：朕茲躬詣山陵，行春祭禮，兼擇壽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駕發鞏華城。午，駐蹕感思殿。
十四日 丁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詣長陵、永陵、獻陵、景陵，行春祭禮。長陵、永陵俱率后妃謁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詣長陵、永陵、獻陵、景陵，行春祭禮。長陵、永陵俱率后妃謁見。
十五日 戊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詣昭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行禮。昭陵率后妃謁見。 上命文書房官傳諭：先到祥子嶺，次到楊翠嶺，次到潭峪嶺，次到勒草窪，次到東山口，聖蹟亭。長陵、昭陵不去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詣昭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行禮。昭陵率后妃謁見。 上命文書房官傳諭：先到祥子嶺，次到楊翠嶺，次到潭峪嶺，次到勒草窪，次到東山口，聖蹟亭。長陵、昭陵不去了。
十六日 己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親詣祥子嶺、潭峪嶺、勒草窪，相擇壽宮。至東山口，登聖蹟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親詣祥子嶺、潭峪嶺、勒草窪，相擇壽宮。至東山口，登聖蹟亭。
十七日 庚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率后妃發感思殿。 詣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 行禮畢，駐蹕功德寺行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率后妃發感思殿。 詣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 行禮畢，駐蹕功德寺行宮。 以清明節，遣都督李文貴祭莊敬、哀沖二太子，內官祭憲廟廢后吳氏各墳園。
十八日 辛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駕發功德寺還。 潞王迎于西直門月城內。居守大臣率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等俱于門外候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駕發功德寺還京。 潞王并居守大臣等迎候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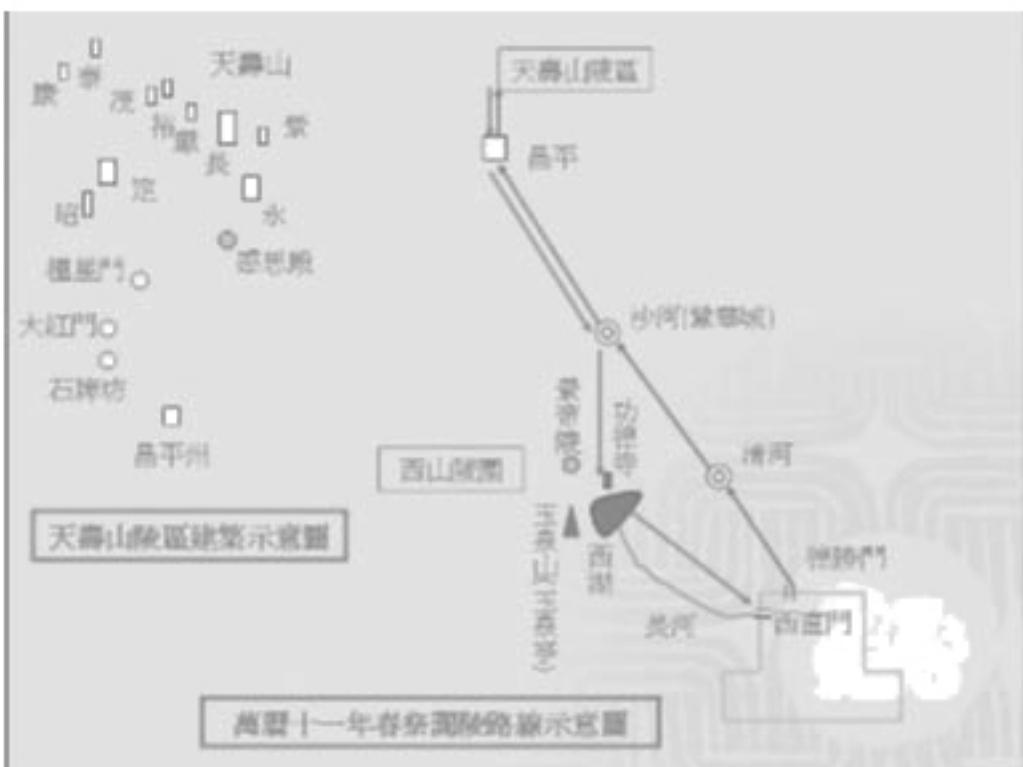


圖28 萬曆十一年春奉天山行幸路線示意圖

此行之後，萬曆又無壽宮事宜兩度謁陵，擇定大塔山無壽宮所在，進行營建，此即今日十三號之定陵。本文重點在正確解讀「出營入廟圖」以明歐鑒作的本事，有關帝陵的御址、興造等問題，此文不論。

七、結 論

「明人出營入廟圖」是呈現皇帝謁陵活動的宮廷史畫，開陵屬五禮中的凶禮，應著黑色服裝。⁶¹ 畫卷卻是禮服，皇帝與百官俱是穿着鮮豔的服裝，如同辦喜事一般。蓋萬曆十一年「詔天壽山行春祭禮，祿澤壽宮，凡樂衛扈從等項一遵皇祖世宗憲靖間定制。」⁶² 嘉靖十五年三月頒定謁陵禮，「百官陪祀其吉服」。⁶³

61 《明》金欽善編，《續修四庫全書電子版》，ID#G6-47a，《崇禎不華錄》：「正統九年四六月，上詔行在崇寧五年：山陵營祀事成存身，服飾禁置，宜著所宜？朕自今後每營奉成、長陵、獻陵、景陵，行道之日與百官依原染色衣服，如洪武永樂制。尚書相與等領旨奉令。」

62 《萬曆九思錄》，第二册，頁322，萬曆十一年閏二月二日乙卯條。

63 《國朝詩賞集》，1857b，嘉靖十五年五月庚午條。

「出警入賈圖」以皇帝御駕壯盛的儀仗隊伍排畫面的主體，可定位為宮廷史畫的皇帝行樂圖。傳世的明代皇帝行樂圖，以宣宗、憲宗為主，畫中或只有皇帝，或再加上宦官、女官、小孩、表演節目者，后妃等女眷絕不入畫。如此，或可知鄒志良認為「如果出警入賈圖的故事，無論是“奉皇太后御駕”，或是“后妃輦輶從”，在圖中必須有后妃的車輦，但是在這兩幅圖中，所有的車輦，都是以輶為飾，可以說這都是皇帝所用的車輦，沒有后妃的。也就是說這一次的調駕，是沒有后妃隨行」⁶⁴ 的說法有商榷的餘地。明代皇帝前往天壽山真西山陞座，由水路而返的調駕活動，一定待奉母后或后妃隨行。「出警圖」中車行與「入賈圖」舟行的畫面中，駕車御搭乘及車旁舟中隨侍者都是宦官或女性，內中所坐的是皇帝的女眷。尤其是紅色的車船，應是妃子與體悅所乘坐（圖29）。⁶⁵換言之，宮廷畫家是以間接含蓄的手法，表明此次調駕有后妃等隨行。不僅此也，如將「出警入賈圖」與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祭謁陵兼擇審官活動的文獻記載對照，也可知並未將諸王送迎於月城之內的情景入畫。后妃、親王都不出現在畫面，只突顯皇帝的威儀方式，可由明代宮廷畫皇帝行樂圖的傳統獲得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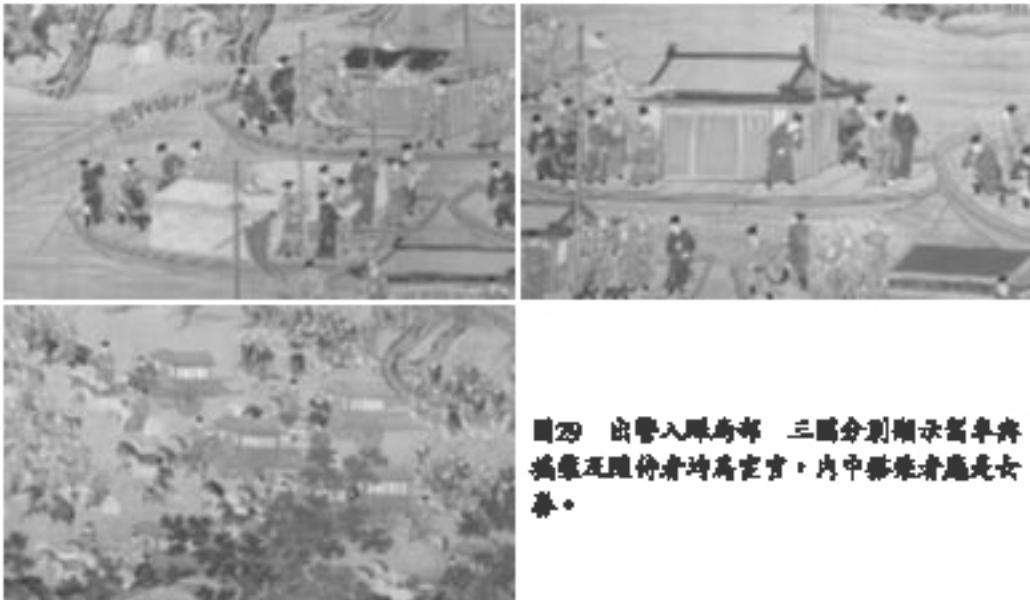


圖29 出警入賈局部 三圖分別顯示駕牛車
搖轎及隨侍者均為宦官，內中乘坐者應是女
眷。

64 鄭志良，〈明人出警入賈圖〉（中央美術），頁5。

65 (明) 沈初：《赤玉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423-24a。〈奏摺〉：「……乃往詣至馬
場院，后妃隨從。隨從衛士官：適宜黃金如意分道列行。直黃金作皇后符號，而如意則御皇后隨
從者也。若是並舉，名分為誰？乘輶車出御前，非宮禁之常儀，抑或有時因仍。非一朝之特怒，
臣等俱不敢知。但成化上嘗謂叔制，象與天授，宜當令官則之內有過禮贈分之禁，停昭近路，聽
禁者尤矣？」

「出警圖」在歷朝式的筆法中，也偶作明白的表達，繪有后級的肩與乙座（鳳頭）（圖30），⁶⁶ 可證知有后隨行。惟明朝幽禁備仗太皇太后、皇太后與皇后同，⁶⁷ 后級肩與的出現，恐不宜詮釋為有母后隨行。蓋若有母后參與閱禮活動，應會呈現表達皇帝尊恩的畫面。于慎行記萬曆十二年九月神宗奉問宮同閣山陵，記：

萬曆甲申，上年兩宮同歸山陵，在西客辇前乘馬導引，不命中道，及山頂御帳，遙望兩宮帳前，主上立待，臣下見之，心甚不寧，此亦失禮。兩客車出，乘輿自當先行，即以前輿為名，亦不必過道，御帳設茶，尚可促居列帳，亦不必立待，使臣下遠見也。⁶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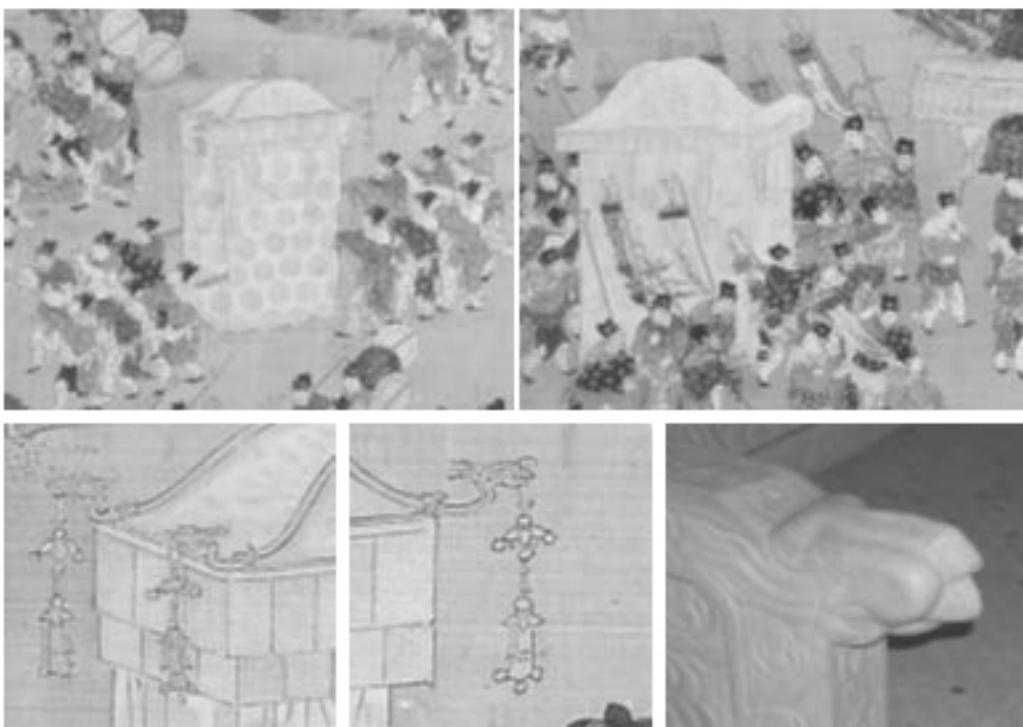


圖30 上排左圖為出警圖皇后肩與，右圖為入葬圖皇后肩與。出警圖繪有鳳頭，入葬圖則無。下排左、中圖為出警圖皇后肩與之輪轂，右圖為明定陵地宮孝靖皇后寶座扶手之鳳頭座券，作為實地証據。

66 「入葬圖」繪有內服的一族禮典，亦不見鳳頭。「出警圖」肩與繪有鳳頭，承林莉姬女士告知，體中附註。

67 (明)郭正統：《宜明典故》，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文海269冊（臺北縣：華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首華圖書出版社萬曆41年刻本影印，1997），《太皇太后皇太后南歸》，1715b。

68 (明)于慎行著，呂景華點校：《續山菴集》(力求：中華書局，1984)，〈祀禮二〉，221。

若有母后隨行，神宗避道在前乘馬導引，「出警圖」應做如此的呈現。「出警圖」用極為隱諱的方式，表明有宮眷隨行，且以皇帝為整圖的聚焦點，中道騎乘，應可知此行無兩宮太后。知此，亦可增強推斷為萬曆十一年閏二月謁陵的可能性。

綜合本文所論，可知「出警入蹕圖」應作於萬曆一、二〇年代，神宗結束謁陵活動之後，因所繪為春景，宣宗玉泉亭、景帝陵都做特寫的表達，又明書「西直橋」表示自西直門返京，且未呈現奉兩宮太后的畫面，故而推斷所繪為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祭兼擇壽宮的謁陵活動。如前所述，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祭謁陵兼擇壽宮，較其他各次的謁陵更有特殊的意義。全圖是採焦點移動的方式，將神宗謁陵出京至天壽山陵區，以及自西山陵園返回宮廷的活動，具體而微的呈現，著重在陸地與舟行鹵簿儀衛的壯盛，表現皇帝的神武與皇家的盛世風華。畫作中雖未呈現皇帝謁陵行禮如儀的畫面，然而將皇帝親自率后妃拜謁的長陵、永陵、昭陵、宣宗恭讓章皇后陵（由前所述，此陵是否入畫不甚確定，但將宣宗建造的玉泉亭以特寫方式入畫，或有藉以表達此行與拜謁宣宗廢后陵有關）、景帝陵，都一一呈現，應是將皇帝謁陵的孝思陰寓其中。「出警入蹕圖」不論在繪事技巧的表現，或是佈局的心思，都不是其他傳世明代宮廷畫作所能望其項背，堪稱是頗富深意的晚明宮廷畫的鉅作。大陸學者楊新概論明代宮廷繪畫的發展，說：

由於明季國力衰微，財政日益枯竭，宮廷已無興趣和力量來支持畫家創作。明代前期和中期，宮廷曾徵召或選拔職業畫家，從宣德到弘治（公元一四二六年—一五〇五年），宮廷繪畫曾經盛極一時，湧現出一批卓有成就的畫家和優秀作品，在中國繪畫史上寫上最重要的一頁。既然朝廷自顧不暇，宮廷繪畫走向衰微就成必然之勢。萬曆之後，宮廷畫家及其繪畫創作雖然還存在，但在畫史上已不值一書了。⁶⁹

瞭解「出警入蹕圖」的本事，及畫師作畫的巧思，楊先生的論斷恐怕應有商榷的餘地。再者，繪製該圖的經驗對丁氏的繪畫創作也應有其影響。正視「出警入蹕圖」在明代繪畫史的重要性，深入研究，不僅可將明代晚期宮廷繪畫史的空白補上，更能對晚明由具有院體風格的吳門唐寅、仇英，到丁雲鵬變形畫的畫風，有更深刻的認識。

69 楊新，〈論晚明繪畫〉，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8明代繪畫（下）》（臺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1。